

学苑丛书

克丽奥之路

—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

张广智 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学苑丛书 ·

克 丽 奥 之 路

——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

张 广 智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介绍

作者：张广智，1939年生，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秋，考入本校历史系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现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史、中外史学评论及世界上古、中古史等课程，主要从事西方史学史兼及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著作有《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等四册，论文有：《维柯史学思想论》、《略论伏尔泰的史学家地位》、《评美国“新史学派”》、《历史学家的文化视野》等四十余篇。

克 丽 奥 之 路

张广智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6,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309-00162-1/K·08 定价：2.50元

前 言

提起克丽奥,要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古希腊神话说,“众神之父”宙斯与记忆女神谟涅摩辛结合,生下了文艺女神缪斯。缪斯年华似锦,容貌美丽,神情高雅,是一个姊妹群体。她们宿洞穴、饮清泉、聚山林,善歌爱舞,追逐嬉笑,逍遥自在。

在古代,缪斯崇拜遍及整个希腊,缪斯庙到处可见。从诗人希西阿德开始,缪斯女神被定为九位,她们的名字和司职是:

克丽奥女神,司历史。

欧忒耳珀女神,司抒情诗。

塔利亚女神,司牧歌和喜剧。

墨尔波墨涅女神,司悲剧。

忒耳普西科拉女神,司舞蹈。

厄拉托女神,司爱情诗。

波吕许谟尼亚女神,司颂歌。

喀利俄珀女神,司史诗。

乌拉尼亚女神,司天文。

克丽奥居众缪斯之首。最初,她大概是司勇士之歌的,后来在希腊的古典时期(公元前六至前四世纪),她才被正式确认为司历史的女神,其固定标志为一卷纸草或羊皮纸。后世西方作家笔下的克丽奥,多已引伸为历史(或历史学)的代名词了。

西方史学之源可以上溯到克丽奥的时代,稍后产生的“荷马史诗”,它包含着真实的历史内核。希罗多德奠定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基础,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念,把古典史学推向高潮。罗马人继承了

古希腊人的文化遗产，史学亦然。西方古典史学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而终结，在神学的桎梏下，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观念统治西方史坛将近有一千年之久。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它回荡着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以伏尔泰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史学，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吉本可以称得上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卓越的历史学家。在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进入全盛时代，因此有“历史学世纪”之称。在这一世纪，兰克及其学派，执西方史学之牛耳。从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至实证主义史学，由于社会的进步，主要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十九世纪西方史学呈递进状，总的是朝着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本世纪以降，各种新史学纷起，对西方传统史学日益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文化形态学”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史学所发生的这种深刻的变化，年鉴学派的迅速崛起，则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从五十年代中叶起，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在历史观念与历史方法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新时代。

“路漫漫其修远。”在这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的精神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汇聚积淀，各种思潮与学派在这里撞击交融，闪出了智慧的光芒，那浩如烟海的鸿篇巨著与文献资料，构筑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宝库，从古希腊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风行当代西方史坛的年鉴学派，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与新陈代谢的西方史学同大千世界的诸多事物一样，也是一个极富魅力与色泽分明的课题。

现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书稿，旨在展示西方史学这一发展过程，这是历史女神——克丽奥在西方所走过的一段漫长的道路，因此本书也就取名为：

《克丽奥之路》。

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工作。但作为一

门学科,西方史学史在我国的“知名度”远不及西方文学史、哲学史、美学史等学科那样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倘若以探索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为己任的历史科学,却漠视自身发展的历史,这就令人费解。笔者以为,研究西方史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举其大者,不妨列举以下几点:

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表明,研究西方史学是打开西方文化之门的一把钥匙。一般说来,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的文化积淀,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 实践中的产物,涵容了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一系列的创造,诸如观念、制度、行为方式、意识形态等等,可见,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显示其全部内容的,历史学就是广义的文化史。特殊地说,史学文化与专注人类文化的某一具体领域(如宗教文化、音乐文化等)不同,它具有着眼考察整个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视野。要对西方文化作出深刻的了解与反思,倘若离开了历史学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学界谈论“史学,处于文化中的文化”这一命题,在我看来,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方面它与其他子文化相互共存在“大文化”(政治、经济)之下并为其所制约,另一方面又说明史学在各个子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处于文化之中,又凌驾于它们之上。恩斯特·卡西尔说过这样的话,对人类文化的分析,离不开历史学,否则它就失去了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①。总之,要全面了解与认识西方文化,是需要借助历史学这把钥匙的。

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又表明,从纷繁的现象与凌乱的事实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去科学地认识社会,指引人类在改造世界与探索人生的过程中,去解开一个个“斯芬克斯之谜”,这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导。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不仅是时代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产物,也是如列宁

① 参见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

所说,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的结果。在马、恩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西方史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书中所阐述的各个时期一些有代表性作家的“天才的闪光”,无论是从古代的修昔底德、阿庇安,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近代以来的伏尔泰、维柯,还是与马、恩同时代的黑格尔等人,都无不为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形成积累了思想资料,创造了理论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产生之后,它必须也应当面对现当代人类在历史学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变革。可以这样认为,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吸收和改造”现当代的思想文化遗产,就像它创立时的那样。如此看来,研究西方史学史,对于我们加深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也是颇有裨益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过去是这样,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加深这样的认识。

西方史学发展的进程还表明,研究西方史学史也是我们认识与了解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窗口。当代中国正在崛起,它再也不是一个沉默者了。志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大业的我国人民,正以过去从未有过的巨大热情,迈步走向世界,投身于国际社会。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后,世界之窗一扇一扇地在我们面前陆续打开了。要走向世界,就需要了解世界。不仅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昨天与前天。因此,当我们在审视当代世界急速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应当把目光投向历史,开拓新的视野,以便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上,寻求振兴中华的理想方案。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当今正在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为了顺利地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我们应当学习与吸收西方文化中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一切积极的成果,为此我们不能拒绝历史所揭示的经验教训,那么,在这方面史学史当不是无所作为的,它理所当然地应成为我们认识与了解西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一个小小的窗口。

从学科的意义而言,西方的史学遗产也是值得我们予以借鉴的。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除我国是一个史学非常发达的国家外,西方的历史学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对于这样一笔文化遗产,我们也需要“弃其蹄毛,留其精华”,批判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不仅富于独创精神,同时又从善如流,善于吸收他人之长,使之成为自己的血肉,丰富自己的文化,不论是古代的唐朝,还是现代的“五四”运动,都注意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从而使我国这两个时期的文化先后放出异彩。今天,在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尤其应当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史学中有唯心主义或其他方面的缺陷,就一概摒弃,全盘否定;同样,盲目信从,简单照搬,也为我们所不取。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科学的分析批判的态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对西方史学采取这种积极的态度,我们一定可以从这种文化的“引进”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种借鉴。

“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中国古书上的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嘲讽迂阔的意思。入海上天,穷尽万事万物,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公式。但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限于作者目前的情况,也只能采取“管窥蠡测”,或蝴蝶点花的方式了。因此,本书不敢自命为一部“经院式”的西方史学史。笔者只是在西方史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摄取若干断面,重点铺陈,对于前述西方史学史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与应承担的崇高任务,本书作者是不敢奢望的。

为了稍稍改变一下历史编纂学历来那种严肃而又刻板的面孔,笔者不仅取了这样一个有悖于传统历史学的书名,而且在写法

上,也作了一些“改革”,我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力求生动活泼,但又不使学术色彩“淡化”;注意到可读性的同时,又不忘严肃的历史学所要表述的主题。风格上的二律背反,有时使我感到困惑,而显得力不从心。但敝帚自珍,我还是期望能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她——一个克丽奥的新形象。确实,西方史学史不能仅仅躲在森严的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也不能只关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她应该走出来,迈向社会,成为各界的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挚友。

我竭诚希望,克丽奥的这一新形象,能为大家所接受,但也祈望广大读者对本书的批评赐教。

目 录

前言	1
一 “欧赫麦鲁斯化”: 神话与史诗	1
二 “史学之父”	12
三 求真的人	21
四 “希腊化”: 难以泯灭的光辉	29
五 史学的魅力	37
六 “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44
七 “阿莉阿德尼的线”断了	52
八 在神学的桎梏下	61
九 新的开端	69
十 交递·过渡·其他	79
十一 理性之光	87
十二 无冕之王	95
十三 朱庇特神庙的晚祷声	103
十四 “天才的闪光”	112
十五 在两个世纪之间	122
十六 “历史学的世纪”	129
十七 陈说的突破	140
十八 “消灭自我”?	149
十九 广布与衍化	159
二十 “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	167

二十一 科学化的探索	176
二十二 发现,再发现.....(上)	186
二十三 发现,再发现.....(下)	195
二十四 在大洋彼岸	202
二十五 文化和文化史	212
二十六 传统史学:SOS	223
二十七 文化形态学	232
二十八 历史哲学	244
二十九 年鉴学派	256
三十 当代史学:从封闭的体系中进一步走出来	266
附录一 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	279
附录二 西方史学史参考书目举要	292
附录三 近年来西方史学史论文要目索引	297

一 “欧赫麦鲁斯化”： 神话与史诗

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从神话与史诗谈起。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历史，而跟神交通的人，即那些宗教家，是最早的历史学家”^①。在邈远的上古时代，神、巫与诗人可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那时，一个氏族的诗人，就是这个氏族的历史档案库。诗人们可以凭借神、凭借巫作为抒发感情的媒介，神人交通的欢悦场面真令后世诗人们艳羨而神往了。

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祭神巫祝，行咏歌手，正是通过世代的口舌相传，为后世保存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最初活动的记录。其后，文字既出，文化渐启，经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与史诗，遂被文人增删修订，形诸文字，这便是我们今日所见到的各文明民族的神话与史诗的遗产了。

诚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话与史诗，已经被蒙上了历史的灰尘，它不可能避开漫长岁月中打在身上的种种时代的印记。但是，只要拨去它的尘埃，剔除文学上的种种渲染成分，我们就可以找到隐匿其间的真实的历史的内核。神话与史诗包含了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而这，正是史学史所要追溯的源头。

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因此西方史学也应溯源到史前时代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古希腊人的历史遗产——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①

古希腊的神话是颇为丰富多彩的，它系列之完整、内容之丰赡、观念之鲜明，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是不多见的。

电闪雷鸣，白昼黑夜，江河湖海，乃至雨后的彩虹，深谷的回声，举凡大自然的一切，在古希腊人看来，都是“万物有灵”的。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类知识的贫乏，他们不可能用科学的方法正确地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便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加以形象化、人格化和神化，“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②

从混沌中产生了地母盖娅，盖娅生天神乌拉诺斯。乌拉诺斯与盖娅结合，生下了十二个提坦巨神（六男六女），在提坦巨神中，普罗米修斯是创造人类，并把天火盗来送给人类的伟大的神。乌拉诺斯成了第一代神界之主宰，后来他被自己的小儿子克洛诺斯推翻。克洛诺斯与提坦女神瑞亚结合，亦生下六男六女。由于克洛诺斯惧怕重蹈先父被子女推翻的覆辙，因此当瑞亚每生一个，他就吞吃一个。最后一个出生的宙斯，躲过了父亲的迫害，终于推翻了克洛诺斯的统治，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诸神的统治。宙斯诞生之前的诸神，这在希腊神话系列中，可统称为前奥林帕斯神系。他们是一些古老的神，实际上都是自然力量与自然现象的化身，其中已涉及到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等，反映了人类黎明时期的情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以宙斯为首建立的“奥林帕斯神系”，也有十二位主神^①：掌管雷电的“众神之父”宙斯、天后赫拉、海神波赛冬、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尔忒弥斯、爱与美之神阿芙洛狄蒂、战神阿瑞斯、火神（匠神）赫斐斯托斯、神使赫尔墨斯、农神得墨特尔、灶神赫斯特亚。这些神当然也代表了某种自然属性，但从这个新的神系开始，在诸神身上，也日益显示出了社会属性。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讲到个人的有柏修斯、提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等，实际上他们是一些活在人民心中的半神或超人，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所完成的十二件功业尤为脍炙人口。他的英雄业绩及其形象，已正在越过神界走向人间，象征着记载真实历史的时代就要到来。讲到集体的英雄，则有以伊阿宋为首的亚尔古船的英雄们为寻取金羊毛而远航的故事；有以梅里格为首众英雄猎取大野猪的故事。这些充分显示了古希腊人在与自然力量作斗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与聪明才智。

希腊神话，由于代代相传，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最后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从零星的神话传说形成了一整套井然有序的故事系列^②，在这过程中必定是经过了无数次的筛选、整理，以自成一统，“可以说，这在古代各民族的神话中是没有先例的。希腊神话创造了一种完美的典范，这一成就至今使人惊奇。”^③

古希腊神话以艺术与哲理的方式多方面地反映了整个自然界

① 在希腊人和拉丁人中，这类神都是“十二位”，在最初的亚述人、迦勒底人、腓尼基人、埃及人中，天神之数也是十二个，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这是因为最初各民族都是用“十二”来代表一个很大的数字（中译本，第332页）。可见“十二”是一种概数，言其众多也。如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所完成的艰巨劳动，是决不止十二件的。这在我国神话中，也有类似的情况。

② 德国的G.斯威布（1792—1850年）所撰《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取材广泛，从多种不同的文献中将凌乱复杂、矛盾歧出的神话传说加以编排、重述，使之前后相贯，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是迄今为止关于古希腊神话的好读本。

③ 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和古希腊处在氏族社会阶段的生活状况,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从中窥见上古时代希腊人处于朦胧中的历史意识(如人本观念),因此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诗是原始的历史,有人这样说。这不奇怪,因为它与神话一样,大体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虽则它的产生要稍晚些,但总的还是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外,至少就荷马史诗来说是如此。

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既有联系但又可以独立的姊妹篇。公元前十二世纪,希腊人为了争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利益,攫取特洛耶“神话般的财富”,对这个位于小亚细亚的富饶的城市发动了一次长达十年的大规模的征战,并最终“木马计”攻破了这个城市。自此以后,在小亚细亚一带便广泛流传着关于这次战争的神话故事和英雄传说。荷马史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透过它的艺术描写,其中必然包含有真实的历史成份,这一点已为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的考古发掘成果所证实^①。

《伊利亚特》写战争本身。但它没有着力叙述战争的全过程,只是集中描写了战争进行到最后一年中的五十一天的情景:战争已进行到第十个年头,双方仍难分胜负,这时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却夺走了阿喀琉斯所宠爱的女俘,这位本领高强的将领一气之下,执意不再参战,并祈求天神宙斯降灾给希腊人。结果希腊联军在战斗中屡屡败北,阿伽门农这时才后悔莫及,赔罪道歉,阿喀琉斯仍不予理睬。后来他的好友帕特洛克斯借了他的盔甲,披挂上阵,结果被特洛耶的英雄赫克托耳杀死了。阿喀琉斯闻讯,悲痛欲绝,遂与阿伽门农修好如初,重上战场,为友报仇。在鏖战中,众神齐来参战,各助一方。最后阿喀琉斯用长枪刺死了赫克托耳,并

^① 参见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1984年版。

把尸体拖在战车后面，绕城三周，以泄怨恨。史诗写至阿喀琉斯交还尸体，特洛耶全城为赫克托耳举行隆重的葬礼结束。

《奥德赛》虽然也取材于特洛耶战争，但它所描述的则是希腊联军中以足智多谋著称的英雄俄底修斯在胜利后渡海还乡，历经艰险的故事。俄底修斯在海上漂泊，浪迹多年，以他的智慧和勇敢，不知战胜了多少灾难，终于回到故乡伊大卡岛，与儿子一起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求婚者，最后和忠贞而美貌的妻子珀涅罗珀团聚。

两部史诗的风格不尽相同。《伊利亚特》是一部描写部落战争的史诗，格调悲壮高昂，节奏急促雄健，是“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①。而《奥德赛》是一部表现航海经历和家庭生活的史诗，风格舒展柔和，节奏缓慢多变。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诗学》中，概括地指出了两部史诗的不同特点，说《伊利亚特》是简单史诗兼英雄史诗，《奥德赛》是复杂史诗兼性格史诗，这不无道理。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的百科全书，也是学童启蒙的必读的教科书，像希罗多德等许多大史家从小就能背诵如流，受到过深刻的影响。亚历山大远征时，除统领三万五千人出征，还随身携带着荷马史诗，在戎马倥偬之际阅读，晚上就寝时，则把《伊利亚特》当作枕头，他是时刻把阿喀琉斯作为自己仿效的榜样的。柏拉图曾说，“荷马培养了整个希腊”，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如此。

在历史上，荷马实有其人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否为荷马所作？这是一个西方学术界长斯以来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疑案。近世以来，论述荷马其人其作的著述，可谓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各派观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形成了“荷马问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页。

据我们看来,所谓“荷马问题”,归根结蒂是史诗的作者问题。在古代,尽管对荷马生平颇多异说,而且他的出生地也有多处,(因为一个城邦被看作是荷马的故乡,似乎成了一种荣誉),但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古典作家并不否认他的存在,也公认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体都持这样的观点。从中世纪直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学术传统一直认为荷马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远古时代的一位伟大诗人,而荷马史诗也成了希腊精神文化的源泉和统一的象征,并被引证作为许多事实和说法的根据。

降及近世,“荷马问题”骤起,法国僧正多比雍和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率先发难。1725年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一书问世,作者在该书第三卷《发现真正的荷马》中,根据这两部史诗本身一些语言文学的证据和他在《诗性智慧》部分所奠定的一些原理,作出了如下的发现:前此人们一直置信的荷马并不存在,他不过是希腊各族民间神话故事说唱人的总代表或原始诗人的想象性的典型人物,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两部史诗之间相隔有数百年之久,所以它们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伊利亚特》当然要先于《奥德赛》,如果前者是荷马少年时的作品,后者则是他晚年的作品,这个“他”只能代表早晚年代不同的全民族,而决不是同一个人。这一“发现”,一时石破天惊,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作出了更详尽的论证。他的同胞拉赫曼更明确地阐述沃氏的观点,从而形成了“短歌说”,称:两部史诗非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它们都曾被分成若干独立的部分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多次的整理加工汇编而成。

与“短歌说”相对立的是“统一说”。此说,实际上是古希腊有关荷马传统看法的复活,以德国学者尼奇为代表,认为荷马其人有关历史的真实性,史诗有完整的艺术结构,作者生活的年代应不晚于